

三位全国人大代表谈诚信社会建设 推进信用修复,让信用“活”起来

两会话民生

□本报全媒体记者 刘钊颖

信用,这张个人与企业的“经济身份证”,一头连着万家灯火的生活希望,一头连着市场经济的奔涌活力。

今年4月1日,《信用修复管理办法》将正式实施。随着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日臻完善,信用修复机制正成为各方关注的新焦点。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人大代表聚焦信用修复的“最后一公里”,积极为那些渴望卸下“包袱”、轻装上阵的市场主体和普通百姓发声。

打通信用修复“最后一公里”

“在现实中,一些企业受到行政处罚后,因行政机关涉企行政处罚信息公开不及时、信用惩戒措施适用不当等问题,导致企业在生产经营、融资贷款、市场准入等方面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西北区域总部代表负红卫告诉记者。

法治化营商环境关乎企业生产发展。近年来,检察机关聚焦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不当适用失信惩戒措施等涉企行政执法司法问题,靶向监督精准治理,依法办理了一批社会信用领域行政检察监督案



负红卫代表



周桐宇代表



石炳启代表

件,精准帮助涉案企业修复信用,在推动社会信用体系不断完善的同时,为企业发展扫清障碍。

负红卫代表对检察机关主动作为、靶向监督,并精准帮助企业修复信用的做法给予肯定。他表示,检察机关既通过监督纠正不当惩戒为企业“松绑”,又通过信用修复助企业“重生”,真正做到了“纠”与“救”并重,让司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他建议检察机关持续加大行政检察监督力度,厘清信用惩戒的适用边界,防止“过度惩戒”“一刀切惩戒”“只惩戒不修复”等问题,推动实现惩戒精准化、修复高效化。进一步强化与行政机关的协同联动,推动建立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合整改、结果反馈的常态化协作机制,逐步打破部门壁垒,助力打通信用修复“最后一公里”。

负红卫代表特别提出,应该依托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精准识别并及时纠正违规公示、超期惩戒、修

复不畅等突出问题,切实减轻企业负担,让守法诚信企业卸下“包袱”,轻装上阵,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加快推进信用修复工作

“我国征信体系快速发展的同时,修复机制仍存在诸多短板。”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威达高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桐宇表示,这些短板不仅使部分因临时资金周转困难、不可抗力等客观因素失信的个人和企业陷入信用困境,也为各类以“征信洗白”“铲单”为名的诈骗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滋生大量“征信修复”“黑灰产”,既损害公众财产安全,也加重了监管负担,扰乱了信用体系秩序。

在周桐宇代表看来,征信修复不仅关系到信用主体的切身利益,更关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成效和消费市场的活力。唯有完善机制、规范流程、强化监管、畅通渠道,才能守住信用体

系的法治底线,传递司法与政策的温度,为诚信社会建设筑牢民生根基。

即将实施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为推进信用修复工作提供了制度依据。周桐宇代表表示,应加紧建立《信用修复管理办法》相关配套机制,为其落地实施提供助力。

周桐宇代表还指出,优化征信修复机制需多管齐下,既要破解群众修复难题,也要坚决遏制黑灰产乱象。在打击黑灰产方面,司法机关应持续加大打击力度,依法严厉查处相关违法行为,通过曝光典型案例提升公众防范意识,从源头挤压黑灰产生存空间。

为乡村振兴注入“信”动力

“国家和地方在信用体系建设上力度很大、成效明显。如今,诚信建设已经融入基层治理、乡村发展和群众生活。”作为一名来自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河间市兴村镇大庄

村党支部书记石炳启深有感触。他表示,无论是信用村、信用户评定,还是村规民约执行、矛盾纠纷调解,产业合作发展,都离不开诚信作保障。诚信已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抓手,也成为老百姓认可的好风气。

同时,石炳启代表也客观指出当前农村信用建设实践中存在的不足:“农村诚信评价体系尚不健全,多依赖口碑,印象等主观判断,缺少统一规范的记录标准和量化指标,可操作性不强,基层信用建设力量相对薄弱,多数村庄没有专职工作人员和常态化工作机制,导致信用建设推进难度较大,难以形成长效发展态势。”

针对这些问题,石炳启代表建议,进一步健全农村信用体系,推动诚信积分、信用档案向基层乡村延伸,实现诚信可记录、可评价、可运用,让诚信真正成为村民的“无形资产”。在失信约束方面,可依托村规民约、村民议事会,对屡教不改的失信行为进行适度约束,形成鲜明导向。同时,加强诚信宣传教育,用身边人、身边事引导群众,推动诚实守信内化为村民的自觉行动。

信用修复并非“一修了之”,而是构建“守信激励、失信惩戒、改正可修”良性循环的关键一环。随着代表们的建议逐步落地,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也将迈向更高水平。当诚信之风吹遍各行各业、浸润城乡角落,信用也将真正成为推动社会进步、惠及全体人民的“金色名片”。

(本报北京3月3日电)

全国人大代表吕卉、白晓艳、许忠:

检察护航文旅行业发展,让游客安心舒心

□本报全媒体记者 常璐倩
吴怡欣
通讯员 苏双丽

打卡“网红城市”品味文化味道,博览名山大川升腾民族自豪感,参观博物馆、纪念馆激发爱国心……近年来,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彰显中国经济蓬勃活力。检察机关立足法律监督职能,在服务保障文旅行业健康发展方面持续发力。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推进旅游强国建设,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四大检察”职能作用,既守好文物文化遗产,更保障好游客出行、消费安全,为服务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贡献更多检察力量。

系统性保护文化资源

山川风物、历史古迹,大自然的馈赠与历史的积淀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源。发展旅游业,首先是保护好旅游资源本身。

在安徽,徽文化闪耀独特魅力,古村落、古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承载着千年文明密码。为持续擦亮这张“金色名片”,2025年以来,安徽省检察机关专门

开展“守护徽风皖韵 助力文旅融合”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立案180件,制发检察建议148件,提起行政公益诉讼11件,为文旅深度融合提供了坚强法治保障。

针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古岗村多处历史建筑长期闲置、活化利用不足等问题,安徽省天长市检察院推动相关职能部门探索“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模式,引入文旅企业,改造20余处闲置历史建筑,开发特色文旅研学线路;针对“南溪古寨”未经审批违法拆除、建筑风貌不协调等问题,安徽省东至县检察院依法监督,推动职能部门对175栋建筑登记造册,投入资金整改20余栋建筑,并对县域26处传统村落开展全覆盖排查,构建长效管护机制。

“检察机关开展专项行动对文化遗

产进行系统性保护,既是守护中华民族的精神根脉,也是激活文旅融合的源头活水。”全国人大代表、安徽广播电视台编创、文化演艺中心副总监吕卉表示,希望检察机关继续深入探索“保护+利用”的协同机制,通过检察建议推动相关部门盘活生态、文化资源,打造更多像“特色文旅研学线路”这样的文旅融合场景。

游客出行安全更有保障

出门旅行,在饱览胜景的同时,最重要的就是身心安全。

在祁连山北麓的怀抱中,有一座平均海拔3200米的小县——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依托生态优势和民族风情,这里的客流量连年攀升。该县检察院检察官在履职中敏锐发

现,当地9家景区因各种原因都没有配备自动体外除颤器(AED),而该县海拔高易缺氧,且大部分景区距离县城医院较远,游客一旦突发心脏病,若没有AED等急救设备,很可能错失“黄金4分钟”。

为了保障游客的身心安全,该院综合研判后,依法向当地文旅部门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督促各景区尽快配备AED,并建立日常巡检、维护制度。如今,9家景区已配备AED15台。文旅部门还请专人给景区工作人员进行了AED操作使用培训。

“检察机关强化公益诉讼履职,督促文旅部门及时完善旅行安全保障设施,有利于帮助当地将‘流量’变‘留量’。”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白晓艳表示,希

望检察机关深化“府检联动”,积极服务重要景区、重大旅游项目建设,强化对旅游市场食品安全、公共安全等领域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促进文旅融合发展。

严打旅游市场“黄牛”抢票

每逢节假日,不少游客都会选择去博物馆参观、欣赏艺术,增长见识。然而,一些热门博物馆,官方门票一开就“秒空”,但第三方平台却频频现高价票。这背后的玄机就是不法分子利用抢票软件在抢购时抢占博物馆门票。

上海市静安区检察院就曾办理过这样一起案件。犯罪嫌疑人王某从他人处购得一代码文件,只要将其加载到某应用程序中,就可以避开购票小程序的时间限制,提前抢票。之后,王某手握这一“财富密码”招兵买马,成立工作室,专门靠抢票加价出售牟利。一年多时间里,几人累计获利20余万元。

案件被移送至静安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后,检察官认真阅卷,厘清了整个工作室的运作模式。该院对王某等人以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提起公诉,后王某等人被判处有期徒刑。

“技术黄牛”既扰乱了票务管理秩序,又攫取了民众平等享受文化资源的机会。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此类案件不仅确保了旅游资源的有序、公平分配,也让游客消费得安心舒心。”全国人大代表、上海歌剧院艺术总监、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许忠建议检察机关持续加大对旅游消费市场秩序的打击力度,为文旅产业的繁荣发展提供坚实司法保障。

(本报北京3月3日电)



吕卉代表



白晓艳代表



许忠代表

两会观点

黄国委员:

系统性解决在粤港人长者监护难题



本报北京3月3日电(首席记者谢文英)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加速融合发展,越来越多的香港长者选择在广东养老。然而,由于缺乏监护人,他们在医疗决策、入住养老院及身后事处理等方面面临诸多困境。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工会联合会理事长、立法会议员黄国建议,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资助非政府组织在广东设立服务中心,担任监护人角色,解决在粤港人长者的实际困难。

黄国委员说,目前约有56万名香港居民居住在广东省内,其中约11万名65岁以上的长者。这些长者中不乏居家养老者,由于没有亲友作为监护人,难以入住当地养老院,甚至无法作出医疗决策及处理后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3条确立了意定监护制度,允许成年人以书面形式确定监护人,但该法律在实施中存在诸多难点。“不少在广东居家养老的港人长者在当地举目无亲,非亲属担心法律责任及债务风险,拒绝成为监护人。加上广东等地缺乏面向港人长者的社会监护机构,导致这批长者始终无法确立监护人。”黄国委员说。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强调推进社会保障合作,为港澳居民在广东养老创造便利条件。希望能够系统性解决在粤港人长者的监护问题,这将有利于推动大湾区社会保障合作向纵深发展。”黄国委员建议,民政部、广东省政府给予政策支持,由香港特区政府资助非政府组织在广东省开设服务中心,委托其担任有需要的港人长者的监护人,并明确针对医疗、安老及身后事处理等指定项目履行监护人责任。

钟章队委员:

法治协同服务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发展



本报北京3月3日电(首席记者谢文英)

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重大国家战略,交通一体化是其率先突破的重点领域,与先行工程。当前,“轨道上的京津冀”主骨架已基本成型,“一小时通勤圈”初具规模,区域立体互联、高效衔接的交通格局正加快形成。与此同时,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在纵深推进过程中,仍面临跨区域数据不通、调度不畅、标准不一、治理分散等现实难题,其深层原因在于区域间规则衔接不够、制度协同不足。随着智能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在交通领域的深度应用,区域协同对法治保障的要求愈发迫切。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钟章队认为,只有坚持法治先行、制度引领、规则统一,才能从根本上破解行政分割、标准差异、权责不清等体制机制障碍。必须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于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全过程,确保技术创新、数据共享、运营协同在合法合规的框架内有序推进。

春天的盛会

履职·微记录



图①:3月3日,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贵州代表团全国人大代表抵达代表驻地,并举行贵州团全体会议。全国人大代表赵子敏(左)与全国人大代表卢丹(右)在会前进行交流。

图②:3月3日,四川代表团全体会议前,全国人大代表格西王姆(左一)、余德泰(左二)、江吉村(左三)、乔进双梅(右二)、刘艳英(右一)进行交流。

图③:3月3日,全国人大代表徐凤秋(左)向全国人大代表关志洁(中)、甄爱华(右)介绍山东省级非遗项目巨野工笔牡丹画工艺。

图④:3月3日,台湾省代表团组织集体采访,全国人大代表陈云英接受各媒体采访。

图⑤:3月3日,全国人大代表成新湘(中)热情地向曾莲英代表(左)、刘玲珊代表(右)展示《凤穿牡丹》系列变色湘绣作品。

